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0001

“新批评”的运用与文学性的回归

——论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黄杉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采用“新批评”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其着力于发掘作品的审美价值,评析其中的道德意旨。夏志清这种以西方文学审美趣味和现代小说批评方法来评判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难免存在偏狭之处,也受到一些同行批评,但总的看来,其突破了当时学界流行的考据式研究思路,带来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文学性的回归。

关键词: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新批评;审美价值;道德意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1-0127-08

Application of “New Criticism” and Return of Literariness: Hsia Chih-ching’s Study o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HUANG Sh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60s, Hsia Chih-ching adopted the theoretical method of “New Criticism” to study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focusing on exploring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works and analyzing their moral intentions. Hsia Chih-ching’s study on judging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by the aesthetic tast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modern novel criticism method is inevitably narrow and criticized by some peers, but on the whole, it broke through the popular textual research approach prevalent in academic circles at that time and brought the return of the literariness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research.

Keywords: Hsia Chih-ching;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Criticism; aesthetic value; moral intention

夏志清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扬名于中外学界,相较之下,他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似乎稍显黯淡,甚少为后来者提及。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学才被

夏志清视为心目中学术研究的名山事业。早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他便与兄长夏济安提及自己“很想写一本批评中国旧小说的

收稿日期: 2024-08-19

作者简介: 黄杉,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海外汉学。

书”^[1]；至60年代初，在美国院校谋得汉学教职的夏志清开始转向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就《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著作陆续发表评论文章，最后汇集为专著《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是为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代表之作。

本文拟以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心，梳理他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的观点和立场。夏志清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与其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思路一脉相承，都是致力于以文本批评的方式发掘作品的审美价值、道德视景及其发展脉络所传承的特质。若将夏志清的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学术的背景中，追溯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中外学界的发展动向，可以十分清楚地发现身处中西学术交错地带的他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所创造的特殊价值。

一、“新批评”方法的运用

《中国古典小说》出版于1968年，诞生则可追溯到10年之前。早在1958年，正在修订《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稿的夏志清就已开始酝酿自己的古典小说研究计划，他计划“把现成已有英文本的几本中国旧小说，带介绍性地评述一下，看它们究竟文艺价值如何”^{[2][325]}。对夏志清而言，自中国现代小说转向古代小说研究，并不是太过突兀的转折。一方面，就学术理念而言，夏志清既将建立中国文学之“传统”作为学术追求，那么为了叩问中国小说的“传统”所在，转治古典小说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另一方面，当时美国汉学领域的学术环境也直接推动了他的研究转向。夏志清被誉为美国汉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这固然赞誉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却也隐含着当时所面对的尴尬处境：彼时的美国汉学界以古代文学研究为重，现代文学研究乏人问津。对于刚刚踏入汉学研究领域、亟需学术成果以巩固地位的夏志清而言，转向古代小说研究也是合乎时宜之举。

不过，由于之前一直浸淫于西方文学，夏志清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学时感觉有些无从着手。即使在教授汉学课程时，他有意广读中国传统典籍著作，可若要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史，他自己觉得力有不逮。在缺乏中国传统文

学功底的情况下，夏志清如何开展古典小说研究呢？他自知“学问不够，耐心也不够”，于是决定扬长避短，只将“中国几部有名的旧小说，简括地介绍评断一下，这样材料比较manageable，不必多看杂书闲书，研究方面的书籍，除了重要的外，一概不理，反而在研究西洋小说方面多借用新的perspectives”^{[2][446]}。夏志清的学术理念深受美国“新批评”一脉影响，他所要借助的西方小说研究方法，正是他最为熟稔的“新批评”方法。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尽管夏志清并未言明自己的方法理论，也未曾引用相关学者的论述，但纵观全书，其对于“新批评”的运用如盐入水，无处不在。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他开展古典小说批评的基点——对文学本体的关注。夏志清将小说视作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将审度作品的文学价值视为批评的目标。因此，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研究者对小说考据的重视，他并未花过多精力去探究作者身世经历、社会条件或历史背景等外部因素，而专心致志地品鉴小说文本的艺术技巧和审美旨趣。尽管在每章伊始，夏志清都会对作品的成书背景和版本源流做简要介绍，但知人论世或版本考据并非他的关注所在，他批评的重心始终在于考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评价小说艺术价值的高下。因而，不同于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博览群书的准备与建构文学史的追求，《中国古典小说》只是一部以“新批评”方法分析六部经典中国白话小说的批评合集。

没有了建构文学史的宏大要求，反而给了夏志清更多的机会来挥洒自己的批评才能。他既把小说本体视为批评的关注对象，对文本的细读自然不可或缺。纵观全书，他每有所论，必定建基于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和阐释；他细致体味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思想主旨，以彰显小说的审美价值。如此一来，夏志清在批评时所仰仗的，其实就是自身经由英美文学熏陶和现代批评训练而形成的审美素养。他在研究过程中曾坦言道：“我对那几部大书，没有什么研究，其他短篇小说根本没有看过……但把几本小说细读一番后，心得是一定会有的。”^{[3][251]}没有套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概念，也没有皓首穷经的考据功夫，夏志清其实是以一己的审美趣味和批评才能，对六部古典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价。

经由一番细读之后，夏志清对这六部中国古典小说有何“心得”呢？基于“新批评”对小说文字结构的严格要求，他首先注意到小说的文体、语言及叙述艺术。对于谙熟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夏志清来说，中国传统小说在叙述艺术上大多不甚令人满意，大多数明清小说普遍采用“一种近乎论说式的叙述”，“即使常常加入描写和对话，也不难看出小说家缺乏驾驭一个场面的能力和发挥这场面潜在的戏剧本质的野心”^{[4]112}。不过，在西方小说的对照下，他也敏锐地辨识出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中不曾为他人注意到的高超的叙述技巧：他对照《三国演义》的描写与正史记载，发现作者在曹操赤壁之战前盛宴预庆、刘备白帝城托孤等场景构造上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潜质。他认为《儒林外史》呈现出了革命性的叙述技巧——不以说书人口吻，而以人物自身的举止活动塑造形象、推展情节。他盛赞《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最上乘的心理写实作品”^{[4]189}；作者曹雪芹大规模地使用自传经验，使得《红楼梦》拥有其他古典小说少有的心灵探索的素质。

中国古典小说素以人物刻画见长，夏志清亦在诠释小说人物形象上着墨亦多。他不甘于对已有的人物解读随声附和，而是在文本分析之中，以自己的理解重塑经典人物的面目。他认为《三国演义》“斩华雄”“守荆州”“走麦城”等情节“贯穿一致地造成一个结构完整的形象”，常被视为勇猛忠义的关羽，其性格的核心实际是“刚愎自用”^{[4]32}；由《西游记》“四圣试禅心”一节中猪八戒的心理刻画，他发现猪八戒贪婪、懒惰、好色形象的另一面，其实是“一个在追求体面的世俗目标方面得到满足的普通人”^{[4]124}；他指出，《儒林外史》塑造的守财奴严监生，在临终前挑灯芯的情节与他生前打官司、办丧事所展现的大手大脚相矛盾，作者对其吝啬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未能达成前后一致。而且，夏志清也不惮于为小说人物“翻案”，对其作出颠覆刻板印象的解读。譬如，当时《红楼梦》研究者大多褒黛玉而贬宝钗，同情宝黛二人的爱情悲剧，夏志清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认为黛玉的悲剧源于她自怜自伤、孤芳自赏的个性，她的死亡是“用以展示一个自我中心意识在身体和感情两方面的毁灭”^{[4]213}。他对宝钗则满怀同情，认为她面对种种现实的不如意“必

须像圣人一样地发挥忍耐和谦逊的能耐”^{[4]221}；她与宝玉的婚姻不过是为宝玉冲喜的牺牲品。此外，夏志清还大量采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式，为物理解读打开新的思路。他将宋江与李逵比作堂吉珂德与桑丘一般的“双重角色”，把《西游记》中师徒四人与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行脚僧相比较，也将失去神志的贾宝玉类比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变成白痴的米希金亲王；他试图在世界文学的相互联系中重新阐释这些人物形象。

在评鉴艺术价值时，评价小说的道德深度始终是夏志清的审美追求。他在绪论中明确谈到自己的评判标准：“我无意认定故事的细节处理得越周详，小说的艺术也越高；批评的首要任务仍以一则故事或一部小说对人的处境是否有些有趣或言之及义的话要说。”^{[4]14}他以道德关怀和人文意识重新审视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主旨，道出了许多前人未有的创见。其中最别具一格的，莫过于他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解读。《水浒传》的褒扬者历来都将其誉为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侠义小说，夏志清却看到梁山好汉崇尚义气、尚武精神、仗义疏财的背后，隐藏着残暴嗜血、滥杀无辜的黑暗面。当一众好汉落草为寇、成群结党后，作为起义军的梁山集团也难免种种暴虐行径，他以为现代读者可将《水浒传》视作“一则充满吊诡的政治寓言”，“是流氓道德战胜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4]73}。《红楼梦》研究者素来看重前八十回的文学价值，夏志清却偏偏认为后四十回使得整部小说有了完整结构，而且“对这部作品的悲剧的和哲学的深度提供了最感人的证据”^{[4]197}。他没有将宝玉视为传统社会的叛臣逆子，而是从西方基督宗教思想中得到启发，以为宝玉的多情实则近似于“agape”，他的痛苦源于“无法舒解爱与个人解脱这两个相反要求之冲突”^{[4]227}。在他看来，宝玉的困境在于悲天悯人的尘世之爱与离世绝情的解脱之间的两难，这才是《红楼梦》悲剧精神的实质所在。

夏志清奉行“新批评”的方法理念，汲汲于作品审美价值与道德趣旨的追求。他将审美批评与道德批评融为一体，既评价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美感，也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景观。就研究对象而言，从中国现代小说到古典小说，似乎代表着两种相去甚远的研究类型，可若从个人学

术脉络着眼,可以发现其中一以贯之的方法立场、审美趣味以及学术追求。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是夏志清以“新批评”理论实践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成果。

二、“新批评”方法的偏狭

由中国现代小说到明清白话小说,需要跨越不只是研究对象的时代之别,还有创作环境、文体意识、思想形态等众多差异;用现代西方小说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更是需要面对语言、文学传统乃至思想文化等种种隔阂。夏志清以“新批评”的方法理念和西方文学熏陶而成的审美品味来评判中国古典小说,在屡有新见的同时,又是否存在偏狭之处呢?

率先提出质疑的,是同为汉学家的刘若愚。夏志清的论文《〈水浒传〉的再评价》发表后,刘若愚在其论著《中国之侠》中提出了两点异议:一是反驳夏志清指责《水浒传》是“伪史”而非小说创作的说法;刘若愚认为该作毫无疑问是一部小说。二是针对夏志清批评《水浒传》宣扬帮派道德、梁山好汉存在暴虐与厌女倾向,刘若愚指出,“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欣赏《水浒传》的文学性而同意它的道德观”^[5];作者的价值观念总是有时代局限性,批评者不应为此而贬损作品的文学价值。刘若愚对《水浒传》的看法与夏志清恰恰相反,他以为该作是中国侠客小说中的杰作。

对同行的异议,夏志清不能无动于衷。在《中国古典小说》正式出版时,他专门在《水浒传》一章的注释中回应了刘若愚的批评。对于先前论文中“伪史而非小说”的不准确措辞,夏志清进行了修改,但对《水浒传》道德意旨的批驳,他依然保持己见。他为自己辩护道:“我认为以一种比较形式探讨一件艺术作品的道德本体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合理的目标,绝非什么出于道德的‘义愤’。如果我的发现是令人困扰的,那也许是因为我们(我指的是像刘教授和我自己这样的自小就读水浒的人)习惯于把梁山英雄们公开宣布的道德理想和书的道德实质等量齐观,因而不易使我们自己接受一种对他们真正残酷行为的客观看法。”^{[4]259}

夏志清对《水浒传》的道德批评是否有其道理呢?正如刘若愚所言,没有一个作者能够完全

不受特定时代的观念、假定和偏见的影响。不以作品情节是否合乎世俗伦理观念而判断其文学价值的高下,这已经成为当时批评家的共识。对此,夏志清是绝对认可的:“我同意刘教授的说法,即没有一位批评家只因一件艺术作品支持一种与他个人相异的道德体系就贬低它的价值。”^{[4]258}他对于梁山好汉们奉行帮派道德、滥杀无辜、厌女等等行为的谴责,与其说是作为一位道德审判者对书中的残酷描写大惊小怪,倒不如说是作为一位现代批评者无法认可这般行径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侠义之道。在夏志清看来,自己的批判既是在揭露小说的道德实质,也是在揭示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的阴暗面。夏志清的问题更多在于,他自诩自己的阐述是“对他们真正残酷行为的客观看法”,可未曾意识到道德的具体化必须取决于时空条件。采用现代道德观念和人文意识作为古代小说的评判标准,以此判别种种行径是否“野蛮”“残酷”,又何尝不是陷入了道德判断的时代局限中呢?对现代批评者而言,相较于审判何为作品所表现的道德实体,关心传统道德何以如此呈现,或许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以《水浒传》为例,梁山好汉的行为确实存在义气与残暴的两面,但相较于直接将其定义为“非人道”“厌女”或“帮派道德”,更恰当的做法,或许是探究这些行为背后所代表的与士人阶级所不同的民间道德伦理体系,这对于揭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实质更具实质意义。

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道德诠释并非其唯一的争议之处。在《中国古典小说》出版后,韩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卜立德(D. E. Pollard, 1937—2024)两位汉学家以书评的形式,对夏志清所采用的批评方法提出了质疑。韩南指出,面对六部不同时期的中国古代小说时,夏志清需要考虑他所采取的现代小说评论家立场是否始终适用。他以《水浒传》和《红楼梦》之间的叙事技巧演化为例,指出早期更接近于口头文学的小说在结构和修辞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而唯有以进步的眼光看待这些缺陷,才能理清这些小说叙事形式的演化过程。因此,韩南认为夏志清的批评方法运用得最成功的,是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较为成熟的白话小说的批评,因为“这些小说是由饱受中国典籍熏陶的文人所写;他们不受制于传统材料;并且,他们将自己由先

前小说所用的陈词滥调中解放了出来——不使用前人的语言是多么困难！”^[6]而时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讲师的卜立德则说得更为直白，他认为，夏志清陷入了套用“新批评”方法公式的陷阱而忽视了理论背景的差异。譬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古典小说创作者道德意图的矛盾，卜立德认为，在早期白话小说中，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和冲突不一定能反映创作者的道德意图，驳杂的情节来源很难适用强调结构统一的“新批评”方法^[7]。

“新批评”的文学本体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批评研究？或者说，将古代小说视为封闭的文本结构是否合适呢？“新批评”将小说本身视为可供推敲的客体，其理论依据是相信艺术作品是单独存在的、自足的实体，因而可将历史、社会等外部因素置之不理。“新批评”主将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认为，“一篇小说只有显示出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小说的各种成分才会有助于主题的表现”，因此，批评小说总是“先假定某一篇作品是统一的，然后再对它做全面的考察……进行这种考察的唯一方法就是尽量找到贯串在作品里并不断发展着的是怎样的观念、怎样的感情和怎样的态度”^[8]。显然，这种小说批评方式有个不容忽视的前提：作者首先要有严肃的小说创作意识，才能使作品成为可供批评的有机整体。换言之，“新批评”的小说批评理论，是建立于专门化的“文学”概念和西方现代小说艺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反观中国古典小说的成书环境，其与“新批评”的理论背景相去甚远：早期传统小说往往集纳多种文体来源，其造成了情节的驳杂和结构的散漫，而小说文体地位的低下和作者的创作意识又难以促使小说道德思考的深化。因此，当夏志清采用“新批评”的方法审视中国古典小说时，难免感到格格不入。作为中国叙事艺术代表的经典古典小说，我们可以用新批评的眼光去发掘其中的文学价值，但在批评过程中若未考虑种种复杂的外部因素和文学传统的影响，这种做法便有“见树不见林”的危险。若抱持单一的现代批评标准来评判古代小说，其批评视野难免偏狭。因此，在运用“新批评”方法发掘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价值时，也需要以更开放的评价体系和更多元的审美取向，来弥补理论背景和文学传统的差距。

无论是韩南、卜立德对于“新批评”方法应用的异议，还是刘若愚对夏志清道德批评的反驳，其实都是源于对西方理论方法、审美理念运用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质疑。那么，夏志清是否意识到二者的不契合之处呢？事实上，在1958年间，夏志清和兄长夏济安曾就中西小说的文体发展有过一番讨论。夏济安以为，中国古代小说更近于西方的“romance”而非“novel”，因而不便直接以现代小说的批评方式看待中国古代小说。夏志清也承认：“你所指出 novel 和 romance 的分别，实在（是）重新估价旧小说的一个 critical concept。硬要以近代小说的眼光去看旧小说，绝大多数一定不合格，而显得幼稚，但以 romance 的眼光去看它们，可说的话一定较多。”不过，夏志清还是觉得，“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把中国所有小说剧本，全部看一遍，而断定哪几部东西还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 taste 虽然不能算超人一等，但总经过西洋文学的熏陶的，比普通人严正一点”^{[2]259}。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也出现了与上述言论相差无几的论述：“尽管中国小说有许多只有透过历史才能充分了解的特色，我以为除非把它与西洋小说相比，否则我们便无法给予中国小说完全公正的评价……话说回来，即使在欧洲，把写小说认真地当作一种艺术也是近代的发展，我们因此也不能期望始于小市民说唱文学的中国白话小说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鉴赏口味。”^{[4]6-7}由此可见，自研究伊始，夏志清便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古典小说承传的是一种与西方小说的发展环境、文体意识和审美趣味都不尽相同的叙事传统，但他没有采纳夏济安所提出的“以 romance 的眼光”进行研究的意见，而坚持要以“经过西洋文学熏陶的”“严正”的品味，来发掘中国叙事文学的闪光之处，从“绝大多数一定不合格”的古代小说中筛选出经典之作。换言之，他的批评是为了大浪淘沙、去芜存菁，而非追根求源，去解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变化。

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囿于资料短缺和阅读广度，夏志清无法实现其最初将旧小说一一阅读的设想。他对于批评对象的选择，更多是顺应英语学界现有的翻译和学术成果。更致命的局限是，深受欧美文学批评熏陶的夏志清笃信，唯有秉持严正的西方文学品味、参照世界文学的成果作为

批评标准,方能给予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公正的评价。相较于中国小说审美的独特性,他更看重文学审美标准的普适性。这样,在单一的批评标准下,其自然极易导向“中国小说家没有善用小说的艺术”^{[4]14}的结论。西方文学的熏陶和“新批评”方法赋予了夏志清敏锐的洞察力,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批评角度;而他的偏狭之处,恰恰也在于固执于这一批评标准,没有以包容的眼光看待中西小说的差异之处,从而未能欣赏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文学美感所在。

三、文学性的回归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前言中,夏志清如此描述他的方法思路:“采取这种批评研究时,我当然知道在这方面最受尊敬的专家所关怀的一直是考证学。但我以为我们显然不能无期限地忽视中国古典小说的评鉴,而坐待一切有关其著作及出版的难题获得解决。”^{[4]xxxix}尽管他所采用的“新批评”方法存在着争议和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批评方法为当时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评价方式和研究思路。正如夏志清所言,该著最大的学术贡献便是另辟蹊径,在当时以考据校勘为学术主流的环境下,回归至小说的文学性研究。

如若将夏志清的批评与同时期汉学家的研究相互对照,则更能显现出前者的批评方式和学术关注的独特之处。譬如为夏志清此书撰写了书评的韩南,便是当时美国汉学界古代小说研究方面的专家。韩南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职,他的论著更能代表当时欧美汉学界古代小说研究的普遍趋向。韩南的博士论文为《金瓶梅》的版本考察与创作渊源考辨,论文详细考证了《金瓶梅》的14个主要版本,辨析了各版本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并且对《金瓶梅》所借鉴的小说、话本、戏曲、史书乃至说唱文学等文本进行了系统的溯源,而后由《金瓶梅》成书的来源得出结论——《金瓶梅》不仅是一家独创,创作者实际上相当广泛地融合了同时代文学,展现出明代通俗文学的风貌^{[9]161-264}。与夏志清《中国旧白话短篇小说里的社会与自我》一文形成对照的,是韩南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杜

十娘怒沉百宝箱〉撰述考》一文。他将明代宋澄所作的传奇故事《珠衫》《负情侬传》与白话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进行比较,以追溯这两篇小说在成文过程中的变更情况^{[9]101}。不同于夏志清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短篇小说所展现出的人性表现和道德主旨的关注,韩南的注意力集中在传奇改写为白话小说的过程中,叙述手法、作者的题材处理手法以及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的异同,对于作品的道德表现主旨只是顺带一提。可以说,韩南代表了当时汉学界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风尚——资料丰赡、考据详实、论证审慎,哪怕是研究作品的艺术形式演变,也必由故事的考辨和版本源流的考据而出。相较之下,夏志清就孤立文本而进行批评的方法、对于小说的审美价值和道德意旨的关注,于当时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而言,可谓别开生面。

如果放大视野,将夏志清的研究置于中国学术发展的纵横时空,则更能显现出他置身于中西学术经纬交错之中的特殊意义。在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史学化乃是鲜明的特征。王国维在论《红楼梦》时曾有言:“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10]由此可见,清代的小说评点多是以考据之法进行解读的。至近代小说文体地位上升,小说研究日趋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考据则被胡适等学者视为“科学”的小说研究方法而大行其道。胡适在研究《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时,引入了“母题”概念。他搜罗数百年间的相关故事,再按时序建立演变谱系,以观察故事的变迁沿革。而在《红楼梦》研究中,他通过对著者和版本源流的考辨,创造性地提出“作者自传说”,从而开启了红学研究的新阶段。正是胡适的研究,以“科学的方法”和“历史的眼光”规避了之前小说评点的主观臆测和穿凿附会,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转型确立了新的学术范式,促使考据式的文学研究在当时中国学界蔚然成风。

这种学术风尚自然也影响了欧美汉学界的小说研究思路。据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 1906—1980)回忆,在他最初从事汉学研究时,他阅读中国小说被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他的导师告诉他中国小说“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因为欧洲学者接受了中国旧文人的观点，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11]145-146}。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来到北京，在当时中国学者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小说研究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早先就对中国小说很感兴趣，但是在他（郑振铎）的影响下我才陷入一种狂热的爱……这完全是一种侦探式的搜索，寻找、收集一些特殊的东西，为此而东奔西走。”^{[11]306-307}在普实克的描述中，寻找古籍、追溯版本源流、查清作者身份，都成了令人激动万分、乐趣无穷的活动，可见当时欧洲汉学家亦受中国学界考据化治学思路的影响。

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固然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种研究方式大多落实为故事考辩、版本校勘等考据方法，而非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可以想见，经由系统文学批评训练的夏志清，对于这类考据之法难免兴致索然。夏志清刚开展《红楼梦》研究时，夏济安曾与他谈及近代以来的红学研究，他的看法或可作为“新批评”一派批评家看待考据式研究的态度：“我们大约是不可能这样精心地写考证文章的，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对于旧小说的考证，也没多少成绩……我是很不赞成胡适和周汝昌的认为《红楼梦》即是‘自传’的极端主张的。在周汝昌以后的传记家，倒渐渐要恢复《红楼梦》的小说的面目了。这也许才是‘红学’研究的真正的开始。”^{[3]241-242}在夏氏兄弟看来，近代学者的研究考证虽详，但其对于小说本身的文学性却有所忽略；唯有恢复“小说的面目”，才是文学研究的“真正的开始”。因此，当夏志清率先将“新批评”方法用于《红楼梦》时，夏济安大为兴奋：“你对于《红楼梦》的意见很精彩……胡适的榜样放在那里，学者们所走的路的确是会变狭的。你来写旧小说研究，必可用世界眼光估计它们的价值，为中国文学批评开一新路。”^{[3]309}夏志清为古典小说批评所开的“新路”，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来说，其颇为新鲜。据白先勇回忆，当时台湾的中文系课程还相当保守，夏志清的批评文章“在台湾当了开路先锋”，使得台湾学界转出“考证”的圈子，看到了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4]xxvii-xxviii}。

反观“新批评”一脉的发展境况，又恰好与汉学界的学术动向形成反差。美国的“新批评”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的文学研究过分

强调对传记和历史背景的考据，“新批评”主张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特性的方法理论，实际上就是为了反抗泛滥的考据式研究。可以说，夏志清所面对的学术环境，与“新批评”最初指向的文学研究弊病的确存在着微妙的相似之处，因此他采用该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当夏志清将之用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批评之时，“新批评”在美国学界已有盛极而衰的迹象，当时，许多新批评研究将文学作品视为完全封闭的系统，沉迷于琢磨其中的符号、象征，其研究距离研究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的目标越来越远。1960年，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的文章中写道：“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以及把文学作为一种共时现象加以解释和评价的整个工作，都遭到了怀疑和抵制。新批评，实际上所有的批评，今天都处于守势。”^[12]不过，夏志清的批评实践却尽量避免了当时“新批评”被诟病的弊端。他虽然认可小说是自成系统的语言结构，但是他的批评却没有与文本外广大的人文世界和历史背景脱节，而是致力于探索中国传统小说的美学和道德价值。正是拥有融贯中西学术的视野，他才能打破文学界与汉学界之间的隔膜，为汉学研究方法注入新鲜血液；他在古代小说研究中“错时”地运用“新批评”方法，也可视作推动汉学学术研究转型的一种尝试。

总而言之，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不仅跨文化地联系着中西学术，同时也贯穿着中国学术思路的现代转型。在今日看来，夏志清所采用的文本细读、主旨分析等方法，对于小说研究而言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却鲜少有学者以系统的批评方法来衡量古代小说的艺术手法和文学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志清的批评方法重新将视线聚焦于古典小说的审美价值，以敏锐的批评眼光重新解读传统小说的美学意义，使得小说研究回归于文学性本身，而这些恰恰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汉学领域乃至中国学界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所少见的存在。如何以“现代”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发掘其中的文学价值，始终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追求目标，从这一维度而言，夏志清的研究也可说是在中西学术交错之中进行了一次颇具启示

意义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 王洞, 季进.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卷二(1950—1955) [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5: 200.
- [2] 王洞, 季进.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卷三(1955—1959) [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
- [3] 王洞, 季进.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卷四(1959—1962) [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8.
- [4] 夏志清. 中国古典小说 [M]. 何欣, 庄信正, 林耀福, 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6.
- [5] 刘若愚. 中国之侠 [M]. 周清霖, 唐发锐,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114.
- [6] HANAN P. Rivew: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69(29): 295.
- [7] POLLARD D E. Rivew: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9(32): 642.

- [8] 克林斯·布鲁克斯, 罗伯特·潘·沃伦. 小说鉴赏 [M]. 主万, 冯亦代, 丰子恺, 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6: 265.
- [9] 韩南. 韩南中国小说论集 [M]. 王秋桂,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0] 王国维.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4.
- [11]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中国: 我的姐妹 [M]. 丛林, 陈平陵, 李梅,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12] 韦勒克.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 [M]// 赵毅衡. “新批评”文集.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551.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26页) 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关键领域改革的实践智慧。

参考文献:

- [1] 刘贯文, 吴德春, 董继武. 中国煤炭价格 [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0: 284.
- [2] 裴西平. 煤炭价格导论 [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7: 57.
- [3] 丁志华. 煤炭价格波动对我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研究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 53.
- [4] 朱美峰.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传导效应研究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 101.
- [5] 张华明, 赵国浩, 焦斌龙. 煤炭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体系研究 [M].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1: 121.
- [6] 当代中国物资流通编辑委员会. 当代中国物资流通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245.

- [7] 当代中国的物价编辑委员会. 当代中国的物价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137.
- [8] 张卓元. 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 成效、历程与展望 [J]. 红旗文稿, 2008(23): 2-7.
- [9] 江泽民.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26.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527.
- [11] 煤炭工业部. 中国煤炭工业年鉴 1997 [M].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1998: 246.
- [12]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27.

责任编辑: 徐海燕